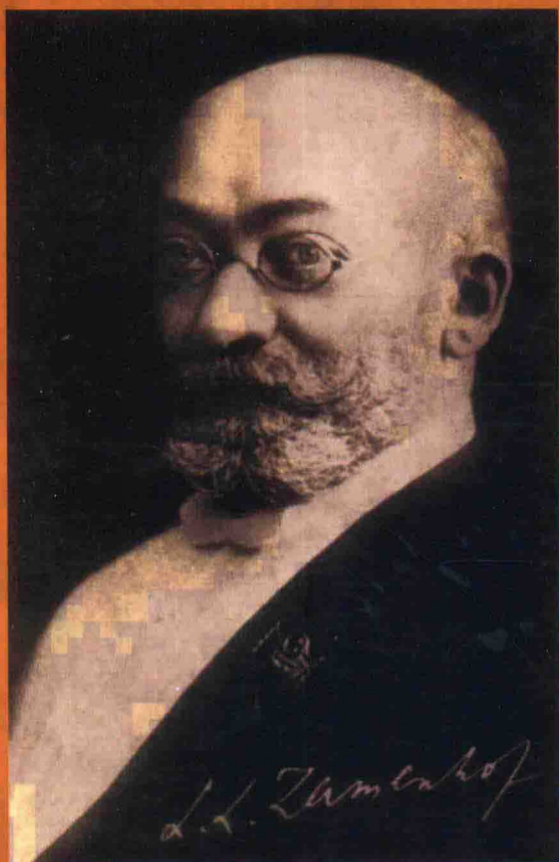


La Kreinto de Esperantismo kaj Homaranismo



— D-ro Zamenhof kaj Lia Familio

何似文集 ①

世界语主义与人类一员主义创始人 柴门霍夫博士及其家族

宋韵声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何似文集①

世界语主义与人类一员主义创始人 柴门霍夫博士及其家族

宋韵声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语主义与人类一员主义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及其家族/宋韵声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7. 9

(何似文集; ①)

ISBN 978-7-5610-8791-6

I. ①世… II. ①宋… III. ①柴门霍甫 (Zamenhof, Lazarus Ludwig 1859—1917) —生平事迹②柴门霍甫 (Zamenhof, Lazarus Ludwig 1859—1917) —家族—史料
IV. ①K835.135.5②K835.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8100 号

世界语主义与人类一员主义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及其家族

SHIJIEYU ZHUYI YU RENLEI YIYUANZHUYI CHUANGSHIREN CHAIMENHUOFU BOSHI JIQI JIAZU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10

字 数: 27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景泓

封面设计: 憬 鸿

责任校对: 赵丽娜

书 号: ISBN 978-7-5610-8791-6

定 价: 4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总 序

近一段时间给辽宁大学出版社主编《学者文库》，第一辑稿件已齐备，正在审阅之中，内含一部笔者自撰的稿子。

有一天，我突然萌发一个念头，想到从前出版过不少单行本的书，亦在一些文库或丛书中出版过作品。如今何不可将自己的文稿放在一起组成系列出版。如能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的东西归了堆，又似乎比东一本西一本地显得更“厚重”。

自觉这个主意不错，便立刻行动起来。首先是找旧书稿、列书名，再加上拟撰的三四种，总共有十几部吧。估算一下文字量，少说也有四五百万言，堪称一种小有规模的文集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给文集起一个名字，可一时竟拿不出名字。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滋味。按理说，作品都是我自己写的，要叫《宋韵声文集》，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名副其实。问题在于我并不想用这样的书名，这倒不是由于不自信，而是有所顾虑。以往，凡是以作者姓名作为文集书名的，多是名家、大家，或者影响广泛的人，而自己不过一介普通文人，这样做似乎显得过于张扬，难免有抬高自己之嫌，还容易招来鼻斥。

思前想后，只得作罢。要取另外的名字，不仅难以涵盖十几种内容几乎互不相干的书，也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所以，由于一

时想不出适当的书名，此事就暂时搁下了。

另有一天，我曾在32年前用过的一个笔名——何似——突然进入我的脑海，让我一下子解决了文集名字的难题。

昔日，字、号是每个读书人都必有的传统，为了附庸风雅，一些非文人也都喜欢起一个字或号。当今社会推行实名制，不仅字、号全无，甚至别名也一扫而光。在文化界用笔名撰文著书者越来越少，将来也许会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起笔名，也没有那种雅兴。但在1986年因临时需要不得不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春风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社里收到一部译稿，请我外校一下。外审、外校是出版社常用的一个术语，其意思是在出版社人手不足或专业知识欠缺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书籍出版的质量而采取的一种辅助办法。审、校者不署名，出版社按规定付予适当的报酬。

请我审校的这部译稿叫《通向顶峰》，是美国曾经参加过总统竞选的汽车大亨艾阿科卡写的自传。该书在美国甚为畅销。台湾很快就有了中译本，书名为《转败为胜》。沈阳有人从美国带回英文版原著，立刻组织人员翻译，参加者八人。由于为多人所译，出版社决定找人统校全稿。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名下。

我在校稿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多人合译的弊病：笔法不同，译名未统一。甚至在数字的翻译上，由于英美制的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差错。在审校过程中，我除了更正误译、弥补漏译几百处之外，还要做术语与专名的统一及文字的润色工作。

出版社看过校改过的书稿后，对原稿很不满意。于是便做出了新的决定：给我署校译者名，并按规定付全部稿酬的40%。看来是已不把我当成普通的外校者，而是当成了校译专家。这个决

定令我诚惶诚恐，一时难以接受。这岂不是我既占了人家的名，又拿了人家的钱。再说，那位主译者是辽宁译界的名人，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我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能干这样大不韪的事。

我断然谢绝了出版社的美意，连说万万使不得，并讲出了我的理由和担心，出版社听后十分理解。最后他们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提供一个笔名印在书上，如要译者方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某一大学的一位教授应付过去算了。

当出版社将校改稿返回译者请他们誊清后付印时，主译者除面有愠色地问了校译者是谁之外，没再说什么。事隔不久，《通向顶峰》一书问世了。在书的封面上印有四位译者的名字，实为八位译者各取其名字中的一个字或两个字组合而成的，下面一行印有“何似校译”四个字。这个“何似”就是当时我提供的应付差事的笔名。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交待一下笔名“何似”的产生经过。当出版社让我提供一个笔名的时候，我的心情的确很纠结。我在想，本来是认真负责地做了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但又碍于情面和世俗观念，不想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印在书上，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应该说这种想法还是符合生活实际和世态人情的。我不想，抑或说我不敢直署其名还是有其苦衷的，这事换了别人恐怕也会如此处理。

为了避免结怨以求彼此相安无事，我答应尽快提供一个笔名。给一个待生儿或初生儿起名，不能随随便便。一个文人给自己起笔名更不能马马虎虎，动一番脑筋还是需要的。起个笔名怎么也应该有点说道吧？至少也该有点寓意或寄托吧？更何况按中国人的传统向来都是十分重视“名”的。比如，佛家认为：是名张三即非张三；道家认为：名可名，非常名；儒家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是说，无论从哪种观点看，都不能把起名的事视同

儿戏。这事如能从长计议，说不定哪天我会想出一个可心的笔名。但出版时间紧迫，不容我斟酌细想。当时，我确实有一种起个笔名要比写一篇文章更难的感觉。

为了这个笔名，我真的陷入了“浮想联翩”的境界。经过一个晚上的胡思乱想，依然毫无结果。就在我万般无奈地长嘘了一口气之后，脱口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我像什么呢？”几乎与此同时，“何似”两个字从我头脑里跳了出来。于是，我把它写在纸上，一边端详一边念。这还真不是我胡编乱造杜撰出来的一个词，到词典上可以查到“何似”一词，其意思同“何如”，倒很像人的名字。叫何如的人不少，我有一个同行就叫何如。叫何似的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何”姓在“百家姓”中位居第21，是一个普通姓氏。“何似”不仅听起来像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叫起来也不拗口。就这样，我便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笔名告诉给了出版社。

有了笔名，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印到了书的封面上。事后我如何能不仔细推敲一番呢？怎么能不为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解解嘲呢？我就开始“别有用心”地琢磨起来。首先，“何似”的字面意思就是“像什么呢”，这也就解释了我当时的心境。其次，“何似”谐音“合适”，就是说没有什么亏可吃。最后再从字的形体上看，二字皆为人字旁，右边合起来是“可以”二字，我就牵强附会地妄加解释，说这二字仿佛是在暗示，说我作为一个“人”还是可以的。我竟荒唐地做起文字游戏来。

我还尝试为自己的笔名找到了两个既典雅又比较符合我的身世的出处：

其一，是杜甫的名诗《旅夜书怀》的最后两句：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其二，是苏东坡的《和子由澠池怀旧》一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当年应差而为自己起笔名之事，一恍已过去 30 多年了，虽谈不上什么秘密，但毕竟不为别人所知，我在此“故弄玄虚”地做“解密”之谈，也未见得有什么不妥，就是当年的相关者读到了这段文字，想必也一定会“相逢一笑”的。

想当初不知是何许人的“何似”，在沉寂了 30 多年后又出现了。他是复活了呢？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消亡？笔者也不得而知。反正他在沉睡了多年之后突然走出来，挺胸叠肚、昂首阔步地走出来，一反当年那种畏畏缩缩、腼腆腼腆的姿态。它也不必再担心有人会问“他是谁？”

这次，何似一露头就要与公众见面，他要被赫然地印在即将出版的一本接一本书的封面上，在他之后还有千百万字的“子孙”。他不必再乔装打扮怕人认出来，更不怕与别人并列，说不定还会有人希望同他并列呢。我作为他的真身，岂能不为他而感到骄傲，岂能不分享到一份喜悦。

“何似”当年为我做过贡献，可我慢待了人家。今天，我要重新起用他，我相信他定会不计前嫌再建新功。

当年起笔名为“何似”，乃是刹那之念。今日要用“何似”为文集之名，亦是刹那之念。既无根据，又无理由。这是偶然呢？还是天意？也许偶然与天意本来就是一回事，只是说法或看法不同而已。如今，他作为我的替身可以遨游江湖，甚至可以 going with the wind 了。

这个总序，我除了想为“何似”正正名以外，什么都不想写。尽管如此，还难免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感觉。说心里话，这种何似的感觉至今犹存。但比起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几位学界朋友来，还是很幸运的。

《何似文集》能出多少本，能出到什么时候，我心中无数，但有一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我想把每一本书都献给一个人或一些人。

本序文虽有点啰嗦，但却是有感而发，万望知我诸君理解为盼。

作 者

丁酉年大暑写于沈阳黄海花园寓所

序

本书的出版可算是今年的一个意外收获，因为它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内。

春节期间，国际世协委员吴国江先生打电话给我拜年时，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前已宣布将 2017 年命名为“国际柴门霍夫年”的决定一事。随后我便萌生了要为这位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及其家族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真正的意义上讲，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是屈指可数的，柴门霍夫博士堪称是名副其实的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柴门霍夫博士诞辰 100 周年并高度评价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曾将他定为“1959 年世界文化名人”。今年——2017 年是柴门霍夫博士逝世 100 周年，又将该年度定为“国际柴门霍夫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宗旨在于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的国际合作以利于世界和平。它能在成立之后短短的 70 年中，两次将至高无上的荣誉给予柴门霍夫博士，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种情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今天，在此借着写序言的机会，我也壮胆而大言不惭地说，我写的这本书在中国文化史上迄今为止也是独一无二的。

当今世界的历史之求、时代之求的制高点是“和谐”。一百多年前的柴门霍夫博士就是为了这个理想的创造、宣传和推广而奋斗终生的。在其伟大理想的感召下，他的全部家庭成员都投身于这一神圣事业之中，为人类树立起家庭先进文化的光辉典范。

和谐，不仅是柴门霍夫博士哲学思想的精髓，更是全人类的

共同愿望。和谐思想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建立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实践表明，中国在维护世界和谐中，一直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能为一位世所公认的伟大人物写一本书，能为一种伟大的思想写一点感受，是历史赋予我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仅把它视为一种荣幸，而且也认为是得天独厚。我甚至希冀能在为伟大人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过程中分享到一点伟大的感觉，还奢望能借伟人之光照亮我的人生，甚至幻想能在与伟大人物的神交中汲取神秘的灵感。

我的书是给同时代人和后人写的，归根结底是给历史写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写给历史的东西就是历史。

常言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本计划外的书竟列到了《何似文集》的首卷，堪称人书两望。是为序。

丁酉年大暑后一日，我的龙凤
胎外孙及外孙女十三周岁生日
之当天写于沈阳黄海花园寓所

目 录

一、世界语创始人拉扎罗·路德维克·柴门霍夫博士 (1859—1917)	1
二、世界语创始人的父母——马尔科·柴门霍夫 (1837—1907)	
及罗莎莉娅·苏菲 (1839—1892)	143
三、世界语创始人的夫人克拉拉·柴门霍夫 (1863—1924)	157
四、世界语创始人的儿子——亚当·柴门霍夫博士 (1888—1940)	168
五、世界语创始人的儿媳——万达·柴门霍夫博士 (1893—1954)	177
六、世界语创始人的长女——索菲娅·柴门霍夫博士 (1889—1942)	187
七、世界语创始人的次女——莉迪雅·柴门霍夫硕士 (1904—1942)	196
八、世界语创始人的二弟——非力克斯·柴门霍夫	

(1868—1933)	218
九、世界语创始人的三弟——亨利克·柴门霍夫	
(1871—1932)	233
十、世界语创始人的四弟——雷欧诺·柴门霍夫博士	
(1875—1934)	243
十一、世界语创始人的五弟——亚历山大·柴门霍夫博士	
(1877—1916)	261
十二、世界语创始人的二妹——法尼·柴门霍夫	
(1862—1892)	269
十三、世界语创始人的三妹——奥古斯塔·海尔梅林-柴门霍夫	
(1864—1934)	272
十四、世界语创始人的四妹——伊达·柴门霍夫	
(1879—1942)	279
十五、世界语创始人的孙子——路易斯·克里斯托夫·扎雷斯基 -	
柴门霍夫工程师 (1925—)	281
主要参考书目	298

一、世界语创始人

拉扎罗·路德维克·柴门霍夫博士

(1859—1917)

能够把世界语的创造者、人类善行的实践者柴门霍夫博士的传记写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笔者深知其难。所幸是笔者已得到几种有关他生平和活动的书。特别是还备有一套几十卷本的皇皇巨著《拉·路·柴门霍夫全集》。借助这些前人的资料，才增强了我擢笔的信心。

拉扎罗·路德维克·柴门霍夫于1859年12月15日出生在波兰格罗德诺（Grodno）郡的比亚韦斯托克（Biatystok）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也是在那里形成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如果从出生的年代讲，波兰籍科学家居里夫人，只比柴门霍夫小8岁，基本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凡是熟悉居里夫人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人，就大致可以想象出柴门霍夫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

波兰民族在近代和现代史上，一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之一。波兰人有句传统的格言：“争取我们和你们的自由！”这句格言充分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波兰人曾经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



自由做过长期英勇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在欧洲的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波兰那样，在领土和居民民族成分上发生过那样巨大的变化。

波兰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国家，是传统的农业国。16 世纪到 17 世纪，它曾经是西欧的粮食主要供应国，它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是连接东欧和西欧的桥梁。这种地理位置，注定了它长期在政治上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它的西边是野心勃勃的德国，东边是一心想扩张版图的沙皇俄国。因此，波兰成了欧洲列强的必争之地，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波兰本土几乎从未停止过冲突和战争，堪称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它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只要看过 1905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历史小说《洪流》《十字军骑士》和《火与剑》的人，都会十分清楚波兰人民遭受过什么样的灾难。

在波兰这块美丽而古老的土地上，从几千年以前就生存着一个叫亚利安的古老民族，在波兰北部，他们至今还说着一种与梵文相近似的立陶宛古语，在纯朴的风俗及民歌中，总是散发出一种使人联想到受古代印度影响的神秘气氛。

这个安详的民族，长久地享受着和平的生活，直到 13 世纪以前，从未受到过基督教的熏染。这块古老的土地被许多沼泽以及大片的直到今天还有野牛奔跑的浓密森林所环绕，与外界隔绝，那里的居民仍然跪在巨大的橡树之下，顶礼膜拜大自然的神力。

然而，西方的贪欲和东方的忍耐，终于在那里发生了冲突。在中世纪，条顿的骑士曾远征于此。波兰的贵族吞并了格罗德诺郡一带，把它变成附庸国。莫斯科的沙皇也来攻击过它。其间，在世界各地到处受迫害、被驱逐的犹太人，反倒为此地国王所接纳而纷纷跑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样一来，外来的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在这里开始休养生息，开始创建城市，开始繁衍后代。

随着这个民族的迁入而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和商业，还有他

们的语言——意第绪语，原有的信仰以及星期六的礼拜仪式，甚至还包括样式特殊的服装。这些犹太人，外表虽然显露出多年来经常遭受凌辱的世传的恐惧与怯懦，但其内心，则对先知的传统充满了高傲和自信。

波兰在 10 世纪后半叶形成了一个封建国家，到了 18 世纪末的 1772 年、1793 年和 1795 年，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其中俄国是瓜分和灭亡波兰的罪魁祸首。在这三次瓜分中，俄国得到波兰的 62% 领土，普鲁士得到 20%，奥地利得到 18%。1815 年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又攫取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所占领的大部分波兰领土，并在这部分土地上建立了波兰王国，俄国沙皇自任命为波兰国王。

随着外族的入侵，古老的共和国开始土崩瓦解，几乎所有的贵族阶级都抛弃了老祖宗的语言，无论在心理上或言谈上，都以波兰人自居，只有北部的乡民仍然继续使用着立陶宛古语。波兰语则响彻城堡、天主教堂、高等院校及各种社会团体之中。在城市里，德国人有自己的租界和住宅区。但在商业区的街道上，还是以操着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为主。而凌驾这一切纷繁之上的，是在整个 19 世纪中加重了的俄罗斯帝国的熊掌。每一个城市里，都聚集着大批的俄国士兵、军官和各种等级的官吏。宫廷让俄国的地方行政长官霸占了。市区的广场上，闪烁着俄国教堂的金色塔顶。

在比亚韦斯托克城的街道上，并非总是呈现出友爱与和谐的景象。那里居住着 4 个不同民族的成员：俄罗斯人、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大街上，不同民族的人操着各自的语言，由于沟通不畅而发生误解，相互争吵和咒骂的事司空见惯。他们不仅各自的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也不同。俄罗斯人信奉希腊东正教，波兰人信奉天主教，德国人信奉路德新教，而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每逢礼拜日，各种教徒分别走进各自的教堂。各民族只接待同民族的人，而在各民族之间则存在着严重的隔阂，缺乏社会交流和了解，没有同情和友谊，更不能通婚。他们相互敌视，甚至仇恨，而犹太人或其

他少数民族更是经常遭受凌辱、抢劫和杀戮。他们甚至不知道别人也是人，也爱家庭、妻子和儿女，也有欢乐和痛苦，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波兰人民在一百多年漫长而黑暗的亡国奴生活中并没有屈服，他们不屈不挠地为波兰的独立和自由进行从未间断的殊死斗争。1831年11月的起义、1846年克拉科起义以及1863年的1月起义，无数波兰优秀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为波兰民族壮烈的革命斗争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篇章。

1863年1月，正当柴门霍夫4岁的时候，波兰全国有15个地方同时起义，从1月22日到23日，6000多名起义者向许多沙俄军队驻防地发动了33次进攻。但这次大规模起义，仍然被增援的22万沙皇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合力血腥镇压下去。在起义后的28个月，即1865年4月底，这场英勇的起义彻底失败了。1500多起义者被处死刑，9000多名革命志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还有3万多起义战士战死在波兰国土上。

这次起义后，沙俄政府在圣彼得堡成立了所谓的“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职能就是要取消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波兰王国的下级行政机构一律取消，城乡所有官府一律使用俄语，官办学校一律使用俄语课本，并进行彻底的奴化教育，以谎言和辱骂代替真实的波兰历史，波兰在地图上从此消失了近一个世纪。

这次大起义以失败告终的时候，柴门霍夫才6岁，仍然住在比亚韦斯托克城。起义失败给人们留下的是血迹斑斑、泪痕和辛酸。为了消解人们的愤怒，俄国政府背信弃义，竭力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使之互相争斗，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这种挑拨离间的政策，加深了本来就不甚和睦的各民族之间的隔阂。政府还利用种种物质条件，激化民族间的对立情绪。他们玩弄法律手腕，把农民从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同时却让他们处于没有自己土地的境地。因此，他们仍然必须出卖劳动力来交付地